

1949-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六十年实录

60 Years' Document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神州板荡(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三卷

神州板荡

(1966 年—1976 年)

(下)



1971年

1971年综述

2月—4月，华北会议结束，宣布北京军区改组；中共中央召开军委座谈会和批陈整风汇报会，批判陈伯达，批评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这一系列会议贯彻了毛泽东打击林彪集团势力的“掺沙子、甩石头、挖墙角”措施。同时，林立果在上海组织制订了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明确以武力“夺取政权”的目标；随后召开上海、浙江、南京3地林彪集团成员参加的“三国四方”会议。林立果还秘密成立了政变武装别动队“教导队”，进行法西斯训练。

8月中旬，毛泽东前往南方视察，接见了沿途各地的党政军负责人，做了重要谈话，就林彪集团的错误向他们“吹风”。林彪集团获悉后，十分惊恐，加快进行武装政变计划。林立果先后制订了炮击毛泽东专列、炸桥、攻打钓鱼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等具体方案。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政变手令。毛泽东突然从南方提前回到北京，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部署。9月13日凌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仓皇乘坐飞机外逃苏联，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余党或自杀，或被擒，一场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逐步在党内外进行传达。同时，对黄、吴、李、邱等人隔离审查，成立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成立对林、陈反党集团

1
9
7
1
年

神州板荡

进行审查的中央专案组。

12月，中共中央陆续发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同年4月，经毛泽东决定，有关部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促进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公开发表公报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引起了震动。

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突破美国、日本等国的阻挠，以压倒多数票数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此后，大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中国外交新局面开始形成。

同年4月—7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准下发。《纪要》提出对解放后17年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使广大知识分子继续受到严重压制。

同年，继续推行企业下放，地方财政、物资包干等“经济体制改革”。当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绝大部分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原计划，但也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一、基建规模过大，积累率偏高；二、农轻重比例进一步失调；三、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给今后造成了严重不利的影响；四、经济管理混乱，地方各自为政，亏损严重。周恩来发现并指出了“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指示采取了一系列修补措施。年底，中共中央做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办法，要全面发展，多种经营。

同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去世。

主要经济指标：工农业总产值3 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工业总产值2 782亿元，比上年增长14.9%；农业

总产值738亿元，比上年增长3.1%（以上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2.5014亿万吨，比上年增长4.2%；棉花：210.5万吨，比上年下降7.6%；油料：411.3万吨，比上年增长9%；钢：2 132万吨，比上年增长19.8%；原煤：3.92亿吨，比上年增长10.7%；原油：3 941万吨，比上年增长28.6%；发电量：1 384亿度，比上年增长19.4%，基建投资总额340.84亿元，比上年增长9.1%；铁路货运量16.8132亿万吨，比上年增长11.8%；进出口贸易总额120.9亿元，比上年增长7.1%；社会商品零售总额929.2亿元，比上年增长8.38%。国家财政总收入744.7亿元，总支出732.2亿元，结余12.5亿元。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关于国际形势，社论认为：“世界处在革命的大变动的过程中。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关于国内形势，社论指出：“过去的一年，我国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很好。形势越来越好的重要标志，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同亿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更加广泛、更加深刻地结合起来。”社论提出1971年的主要任务是：“我们将迎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诞生50周年，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今年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在政治思想路线、文化教育战线、经济战线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抓紧革命大批判”；“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认真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做好整团建团工作，开好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要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群众运动，“努力全面地完成和超额完成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1月4日—10日 中共上海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 000人。其中工人党员占51%，女党员占26%。张春桥作了政治报告。姚文元就党内的学习问题作了讲话。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决议《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奋勇前进》，选举产生了59名委员和17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经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选出新市委常委16名，张春桥为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为第二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为市委书记。

1月8日 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做出批示。毛泽东批示说：“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林彪批示说：“完全同意，希望按主席批示认真落实。”济南军区政治部1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通过学习毛主席“军队要谨慎”的指示，“通过大谈在战争年代骄傲掉人头，文化大

革命中骄傲吃苦头的教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报告指出：许多同志“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毛泽东于此处批注：“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1月9日—13日 中共辽宁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972名。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陈锡联，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出81名委员和28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辽宁省第四届委员会。经过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选出新省委常委13名，陈锡联为第一书记，曾绍山为第二书记，李伯秋为书记，杨春甫、毛远新为副书记。第一次全体会议做出了《关于学习问题的决定》。

1月11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1月8日重要批示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发”。《通知》指出：“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通知》要求，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读几本书，密切联系实际，开门整风，学习济南军区报告的“三破三立”，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月15日 京剧艺术家盖叫天去世。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1888年生。河北高阳人。童年入天津隆庆和科班，初学武生，后改学老生，倒嗓后复学武生。长期在上海一带演出。继承了南派武生创始人李春来的艺术风格，吸取京剧与昆曲、地方戏中各流派武生和其他行当表演艺术的长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表演艺术。擅长剧目有《武松》、《三岔口》、《一箭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浙江省分会主席，浙江省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月15日在杭州去世。1978年获得平反和恢复名誉。

1月15日—21日 中共安徽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 150名。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德生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出7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安徽省第三届委员会。经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选出新省委常委15名，李德生为省委第一书记，宋佩璋为书记，李任之、梁辑卿、郭宏杰为副书记。

1月20日—28日 中共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杭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 159名。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南萍，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南萍的工作报告，选举出67名委员和22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浙江省第四届委员会。经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省委常委有13人，南萍为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陈励耘、熊应堂为书记，赖可可、谢正浩、柴启琨为副书记。

1月21日—22日 全国高等学校调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国务院科教组主持，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22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讨论了现有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提出工院校一般拟予以保留；农、医、师范院校多数拟保留，少数拟改为中等专业学校或合并；综合大学一般拟先保留下来；财经、政法、民族院校拟多撤销一些。根据会议意见，国家计委、国务院科教组汇总了29个省、市、自治区方案，于1月31日向国务院提出《关于高等院校调整问题的报告》。4月，这个报告提交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确定将全国原有的417所高等院校，保留309所，合并43所，撤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45所；改为中等专业学校17所，改为工厂3所；增设7所。学校管理体制为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地方为主。专业设置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

要》时，同意作为附件的这个调整报告。

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主要内容有：“家庭出身和入党前的个人历史”，“和国民党军阀张贞的关系”，“被捕叛变”，“失掉党的关系问题”，“托派问题”，“在天津工作时的错误和叛徒、特务、工贼刘少奇为陈翻案的问题”，“写反共文章”，“里通外国嫌疑”。第二部分为“投靠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要内容有：“追随王明，鼓吹‘国防文学’和‘国防哲学’”，“一贯投靠和追随刘少奇，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秀才和头面人物”。第三部分为“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主要内容有：“大派工作组，又把自己装扮成反工作组的英雄”，“陈伯达是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进行的几次突出的反党阴谋活动”，“陈伯达借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机会，炮制了一个继承刘贼唯生产力论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分裂党的黑纲领”，“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的阴谋活动”。第四部分为“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同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调整民航收费标准。具体调整方案是：一、将原来不分航程远近每客公里都一样收费的办法，改为递远递减的收费办法。客运票价国际航线不变，国内航线平均降低28%左右。专包机收费，在使用单位不利用回程吨位或调机吨位时，减收30%的费用。专业飞行收费标准，包括执行放射性测量任务和农林业飞行，也分别不同情况有所降低。二、各地县、市以上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科处级以上干部和部队营连职以上干部，以及其他因公需要乘坐飞机者，均允许乘坐民航班机，不受过去规定职务和13级以上级别的限制。民航新的收费标准，自3月1日起实行。

1月3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毛主席建党路线的胜利》。

社论说：“最近，有一批省、市相继隆重举行了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其他省、市、自治区也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党委。这是党的建设的一件大事。”社论指出：这些地方的党代表大会，“认真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从代表的产生，到新党委的选举，都经过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充分酝酿，反复协商”。这些选举的新党委，“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特别可喜的是，许多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老干部”及“一批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进入党的领导班子”。

同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了办“五七干校”的经验，指出：近两年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先后创办了100多所“五七干校”，近9万名干部参加，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五七干校”领导的问题，要求各机关对在职干部下放劳动做出计划，形成制度，坚持下去。会议介绍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安部、外文局、中共中央党校的办校经验。会议讨论了“五七干校”今后的任务，指出干校要分期分批地组织学员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参加劳动，当好“参谋”，搞好革命和生产。

2月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成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成员如下：组长吴德，副组长李震，组员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中共中央确定该组工作方针为：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要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要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处理上要区别主从，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专案工作方针还明确指出：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2月9日—16日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参加大会的有11个民族的党员代表853名。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韦国清，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乘胜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韦国清的工作报告，选举出78名委员和16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经自治区党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自治区党委常委有13名，韦国清为第一书记，韦祖珍为书记，刘重桂、安平生为副书记。

2月10日 中国和尼日利亚在开罗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月11日—17日 中共甘肃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兰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 098名，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冼恒汉，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冼恒汉的工作报告，选举出68名委员和24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甘肃省第五届委员会。经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省委常委有14名，冼恒汉为省委第一书记，皮定均、胡继宗为省委书记。新省委作出了《关于整风的决定》。

2月14日 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座谈当前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在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召开的这个座谈会指出，有些地区出现“改变核算单位和收自留地之风”，“‘分光吃光’、不搞积累”等现象，“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过多”，“增加非生产性用工和开支”等问题，提出应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对待所有制问题应持慎重态度”，要“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用工和开支”等意见。

2月23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中央转发的通知说：2月19日，中央政治局邀集各地来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各大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同志到会。会议上，首先宣读了毛主席对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

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中央通知要求各地和中央领导单位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认真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并联系到庐山会议上反党分子陈伯达的阴谋活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

2月28日—3月5日 中共陕西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808名。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李瑞山，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承和发扬延安革命精神，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并通过了李瑞山的工作报告和《关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决议》，选举出68名委员和29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陕西省第五届委员会。经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省委常委由14人组成，李瑞山为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炜、黄经耀为书记，萧纯、吴桂贤（女）为副书记。

本月 毛泽东对国家旅游局的报告做出批示。国家旅游局在《关于1971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1971年拟接受外国人来华旅行800人—1 000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泽东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3月1日 财政部发出《关于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通知》。《通知》决定自1971年起，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财政收支体制，简称财政收支包干。这是适应1970年决定把大部分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到地方管理的需要，对财政管理体制做的一次较大改革。主要内容是：一、随着中央企业、事业单位的下放，相应地扩大地方财政收支范围。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除了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关税收入和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基本建设、文教行政、国防战备、对外援助和国家物资储备等支出以外，其余都划归地方财政，由地方负责管理。二、地方预算的收支指标，由省、市、自治区提出建议数，经中央综合平衡，

核定下达。中央核定的省、市、自治区预算收支指标，收入大于支出的，包干上缴中央财政（按绝对数包干上缴，不再按比例计算）；支出大于收入的，由中央财政按差额包干给予补助。三、上缴和补助数额确定之后，一般不作调整，地方要保证完成上缴任务，中央要按确定的数字给予补助。四、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地方收支超收或支出结余，都归地方支配使用，如果发生短收或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遇有重大特殊问题可以作适当调整。这项改革，有利于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但在实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有的地区超收很多，有的地区出现短收，造成各地区之间的机动财力苦乐不均。二、对短收的地区中央不补贴过不去，就增加了中央财政平衡困难。三、有些地区把财政包干指标层层包到地、县，地方机动财力过于分散，造成重复建设或经济效果差的基本建设。1971年底财政部又拟定了《关于改进财政收支包干办法的通知》，1972年3月31日正式颁发。《通知》确定在原来财政收支包干办法的基础上，自1972年起，地方超收1亿元以下的，全归地方；超收1亿元以上的部分，一半留给地方，一半上缴中央。并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对地、市、县不能搞层层包干，可以采取收入分成办法或其他办法。

3月2日—8日 中共河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 300人。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刘建勋，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纪登奎在大会上作了讲话。大会讨论通过了刘建勋的工作报告，选出了82名委员和19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河南省第三届委员会。经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省委常委由15人组成，刘建勋为省委第一书记，王新、纪登奎、耿起昌、张树芝为书记。省委第一次全会做出了《关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建设的决定》。

3月3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卫星重量221公斤。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266公里，最远点1 826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9.9度，绕地球一周106分钟。卫星在运行过程中，成功地向地面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

3月3日—30日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会议明确了如下政策：一、合理安排油料、糖料集中产区的粮食征购任务和统销指标，保证社员口粮不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标准。二、油料统购，超额完成任务的部分继续实行加价奖励的办法。留油指标由省、市、自治区自定，增产多、贡献大的可以适当多留。食油继续执行在农村只购不销的政策。油料基本上在产地加工。三、适当提高花生、油菜籽、芝麻、大豆等部分油料、油脂的收购价和糖料的收购价。四、大豆面积和产量与粮食分别计算。一年一熟的大豆集中产区，《纲要》指标定为260斤。五、南方和北方的丘陵山区，要大力发展木本油料，鼓励采集野生油料，种植向日葵、蓖麻。六、社员自留棉换购，由1斤皮棉换3尺布票，改为换5尺布票。3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

3月5日—8日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中国党政代表团同越南党政代表团，就当前印度支那局势和中越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8日，周恩来和范文同在河内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联合公报》。《公报》说，美国新的、极其严重的战争升级，目的为加强对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的侵略，“直接威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也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对亚洲和世界和平造成了危险的局势”。双方强烈谴责尼克松政府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谴责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拼凑一个新的侵略性军事同盟”。

3月6日—11日 中共青海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西宁召开。出席大会的各族党员代表有747名。青海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代表核心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刘贤权的工作报告，选举出45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青海省第五届委员会。经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新省委常委有13人，刘贤权为省委第一书记，张江霖为第二书记，宋长庚为书记，薛宏福、鲁治安、达洛为副书记。新省委第一次全会作

出了《关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决定》。

3月10日—15日 中共北京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 269名。吴德代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党的领导小组，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起来，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吴德的工作报告，选出76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北京市第四届委员会。经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市委常委有15名，谢富治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第二书记，杨俊生、吴忠、黄作珍、刘绍文、丁国钰为书记。市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做出了《关于加强学习，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决定》。

3月13日 台湾当局驻塞内加尔“大使馆”三等秘书孙际洲回到北京。孙际洲不满台湾当局的统治，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前往西贡途中，于3月5日在日内瓦起义。

同日 工程兵副司令员聂鹤亭中将去世。聂鹤亭，1905年10月生。安徽阜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叶挺独立团排长。1927年先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师部参谋，东江特委军委教导营营长，第四军军部参谋，红一方面军副团长、团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战争。参加了长征。后任陕甘支队司令部第一科副科长、科长，西北野战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大队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局长，总参谋部部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先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中共松江省委常委，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辽吉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1956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3月15日 毛泽东批准中国乒乓球队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定于3月28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由于柬埔寨朗诺政府也派队参加，并有可能在比赛中与中国队员相遇，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提出驱逐朗诺政府代表队，由民族团

结政府组队参加。15日，周恩来为此向毛泽东提出请示报告。报告说：“正值我乒乓球队即将出发之际，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报告认为：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做好各种警戒准备。当日，毛泽东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15日—7月22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全国出版部门和工农兵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原计划召开两周，因为面临许多复杂问题，延长4个多月才结束。周恩来于4月12日和6月24日两次接见会议代表，在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出版工作中的极左思潮。他说：“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座谈会提出了今后两年内的出版计划，要求各地领导把出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年抓几次。目前，第一书记应抓一下出版工作。会议提出：出版部门应当健全各级“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创造条件实行三分之一人员坚持工作，三分之一人员调查研究，三分之一人员下放劳动的“三三制”。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同意了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插手，会议报告提出了关于出版战线的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出版战线是“反革命专政”，领导权被“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篡夺了。出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报告要求编辑队伍要“掺沙

子”，吸收工农兵参加。8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经毛泽东批示同意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3月18日—24日 中共吉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春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921名。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淮湘代表核心小组向大会作了题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大会讨论和通过了王淮湘的工作报告，选举出74名委员和15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吉林省第三届委员会。经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和中共中央批准，新省委常委有13人，王淮湘为第一书记，张兆佳、何友发、萧道生、阮泊生、郑季翘为书记。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各级党委革命化建设的决议》。

3月21日 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析形势后认为：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认为林彪“接班”有三种可能，一是“和平接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3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由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将计划定名为“571工程”计划（取“武装起义”谐音）。

3月22日 中国和科威特在科威特签署联合公报，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23日—24日 于新野起草《“571工程”纪要》。《纪要》共分9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在“可能性”中写道：“9·2